第二章中，韦伯开篇探讨资本主义精神的定义。

首先，韦伯提出了探究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历史中一个个独一无二的个体体现出来的现象，通过对个体现象进行研究，可以直白地描述出“资本主义精神”的面貌。之后对这一暂时性的描述进行抽象，便可以构成“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术语完整的定义。

于是，韦伯紧接着便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这些话体现了以下的观念：“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钱可以生钱”，“生活要量入为出，保持节俭”。为了说明这一观念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在个体层面的体现，韦伯首先通过将这些观念与另一位商业家雅各布·福格在私人场所对个人嗜好的表述相对比，强调了富兰克林的话的伦理色彩和教化性质。其次，韦伯反驳了这些观念是极端的功利主义的观点，因为这种观念在宣扬功利地，尽可能努力地工作，尽可能多地赚钱的同时，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成分，相反，努力尽责地工作、赚钱，这些手段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手段，而是本身成为了一种目的——对于功利主义来说，这是完全非理性的。

努力尽责地工作自身成为一种目的，人对其工作负有责任，这在现代社会是一种广为接受的价值观。韦伯指出，这一观念是资本主义精神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甚至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下文中，韦伯探讨这一抽象出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观念的起源和建立的过程。

韦伯认为选择论和唯物主义观点都不足以解释这一过程。韦伯首先论述道：在资本主义已经建立成熟的社会中，一个人如果不愿意适应这个准则就会因失业而流落街头。因此，资本主义有着自我选择出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然而，在没有建立资本主义经济主体的情况下，这一选择就不会发生。接着，韦伯通过对比新英格兰州和马萨诸塞州资本主义精神的发达情况，说明仅仅从唯物主义的上层建筑说也无法解释这一过程。

在反驳了上述两个观点后，韦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资本主义精神是在和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精神进行斗争后才赢得的统治地位。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韦伯首先论述并阐述清楚了资本主义精神和传统精神的差别。这种差别并不在对利益的贪婪追求与否上——拥有传统精神的人的贪欲并不低于前者，甚至表现得更不道德，而是在于劳动者的自觉性上，后者缺乏自觉性。在这种缺乏自觉性的情况下，劳动者的积极性无法被调动，雇主无论是提高计件工价还是降低工资，劳动者都只会试图赚到过上日常习惯的生活所需的那些钱，不愿去更多地工作，不愿去学习和创新。因此，在一个传统精神的环境下，资本主义和它的精神难以发展。

此时韦伯指出，宗教是帮助资本主义精神在这种情境下战胜传统精神的重要因素，韦伯通过举例有宗教背景的女工以及十八世纪卫斯理教徒工人有更强的工作意愿这一点论证了这一论点。这说明了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的密切关联，说明了研究两者关系的必要性。

接下来，韦伯又从企业家的角度来分析传统主义对资本主义精神的阻碍。在传统精神支配下企业家的经济活动的方向仅仅是获得满足个人所需要的必须产品，而非获取更大的利润。韦伯通过举传统放利者的缓慢的经营模式，闲适自在的生活，竞争者间良好的竞争关系来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此时如果有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放利者加入了这场竞争之中，使用理性化过程使用资本，组织劳动，那么其余不跟随他的脚步，做出向资本主义精神的转变的放利者就会因为残酷的精神被淘汰出局。这说明了，一种新的精神的产生即可引发一场商业革命，当然，第一个革新者将会受到很大的攻击，必须要有理性的计算，集中的精力，固守原则的能力才能坚持下来——这些品质与适应传统主义的伦理品质有着天壤之别。

韦伯继而论述上述品质与宗教的关系。

韦伯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适应了政治、法律、经济体制的发展，国家体制的力量把控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控制力量则是宗教。事实上，教会对于追求财富、财政势力逐渐妥协，逐渐建立密切联系。社会逐渐对追求获利的行为给予认可。但是在情感上，无论是教会还是民众仍然抱持排斥反对的态度。最终只有当近代资本主义与近代国家日益强大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时候，它才得以摧毁了中世纪经济生活准则中的那些陈旧腐朽的形式。

本章的最后，韦伯讨论了资本主义精神与理性主义发展的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并提出问题：理性思想的具体形式到底是谁的精神产品，关于职业以及在这职业中献身于劳动的观念从个人幸福的角度看是非理性的，但却成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什么是这种非理性的因素来源呢？